

□ 刘睿思

国学的热度和现代人的迷思

国学这些年是越来越热了——从各个大学国学院的竞争开始，到方兴未艾的小学生读经运动；从于丹、易中天的一飞冲天，到各种国学书籍的大行其道，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学似乎从没有今天这样吸引过人们的眼球。就连刚刚过去不久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它给人们展示的“和为贵”的理念以及琴棋书画、戏曲诗文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分明也是国学另一种艺术化、形象化的宏大展示。像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百年不遇、万众瞩目的国家盛事，能让数千之众的演员把《论语》的经典篇章堂而皇之地向全世界诵之读之，歌之咏之，这对于那些热爱国学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备感欣慰的事情。

为了了解国学有多热，我特意上百度网“百度”了一下，结果吓了我一跳：当输入“国学”二字时，我找到相关网页约9910000篇；而当我搜索“国学热”三个字时，也能找到相

关网页约155000篇。

数字是冰凉的，但从这两个冰凉的数字中，我能感受到国学的热度。

关于国学热，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赞者认为热得还不够，有论者就认为，今天的国学还没真正热起来，还没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理由是，现在读国学经典或读普及读本的人全国有800万。但是现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是一亿两千万。两相比较，国学

的热度还远远不够；而担忧者则认为，所谓国学，其中存在着许多和现代社会背离的价值观，不利于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国学热”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我并不认为国学一定要“成为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不希望把国学和“现代化进程”这样宏大的字眼绝对地联系起来。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国学似乎不必担负如此伟大的功用。我更愿意这样理解：国学在今天的热，是人们文化上的一种自信、自觉，是生活质量提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选择。这就好比过去我们爱吃肉，以为有肉吃，生活就很好了，就OK了，但后来发现，吃菜、吃水果同样重要，甚至比吃肉还重要。国学在今天能够热，恰恰是因为，国学中的许多思想，能够解决当代人在解决好温饱问题后的迷思和困惑，担负了类似我们饮食结构中“菜和水果”的功能。国学经典

所强调的“和为贵”、“内圣外王”、“天人合一”、“一日三省吾身”等思想不仅能够对当今社会的浮躁之气、奢靡之风、喧嚣之声起到抵抗、消除作用，实际上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立身处世的原则，一种个体与社会尽量平衡协调的互动关系。台湾学者龚鹏程说：“我相信，一个受过很深的中国传统熏陶的人，应当是一个不危害他人并会生活的人。”信夫斯言！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当人们发现那些千年的经典能够解决自己当下的精神困惑时，便奉若为宝，进而学之习之，就不足为怪了。黑格尔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当我们把手伸进这堆灰烬里面，还能触摸到它的余温……今天的国学热，庶几是历史留给我们“灰烬的余温”吧。

自然，作为一种学术的国学的繁荣，需要更为严谨的态度和更为周密的规划，有识之

士对于“国学热”无序状态和虚火上升的担忧，大概都是基于这样的层面。但源自个体文化自觉的“国学热”，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需要担忧的。国学向来有两种面孔，或高居庙堂之上，或位于市井之间。于丹、易中天等人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国学从庙堂之上回到了市井之间，让似乎高高在上的国学变得亲近平易。尽管他们有错漏，有误读，而且赚的钱让人眼红，但平心静气，国学能够在民间热闹起来，是普通人心所悟，他们功莫大焉。

于丹曾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她理想中的国学：“中国的国学应该是这样，不是火热，而是温暖，这种温暖是一种陪伴，随时想去感悟，它永远都忠诚地等在那里。”对于中国大多数能够识字、有一定文化程度，而且愿意过有质量的生活的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他们想要、想学的国学。

扶助公用以磨练技艺、培养传人，还积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用”创造条件，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专为歌舞伎等传统艺术表演而修建了“国立剧场”。

不得不承认，我国对“非遗”的保护起步有些晚，被誉为“民族记忆的背影”的民间传说、习俗、语言、音乐、舞蹈、礼仪、庆典、烹调以及传统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相当部分已经消失或濒临消失。近年来政府和民间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正与日俱增，问题在于，对于“非遗”这样一种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活态”文化，怎样的保护才更有利于保持其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在无锡惠山泥人厂，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喻湘莲的一句话掷地有声：民间艺人最可怜的一点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的价值，所以一旦认识就不放弃。事实上，唤醒文化自觉不仅关乎民间艺人，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大家都去买件蓝印花布的衣裳穿，或在家中挂上“南橘北枳”的年画，而是每个人都可能抽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自己身处的城市里有哪些文化遗产，而是让我们的孩子都可以有机会在学校里学习剪纸、捏泥人或者民间舞蹈。因为，只有了解，才能热爱。只有热爱，才能传承。

太空漫步

潘贻明

| | |
|-------|---------|
| 轻轻地 | 自然 |
| 静静地 | 去寻访 |
| 步出了舱门 | 翩翩起舞的嫦娥 |
| 牵着云 | 去见 |
| 驾着雾 | 不醉不老的吴刚 |
| 和着风 | 去亲 |
| 是那么的 | 温情的月亮 |
| 自如 | 去追逐 |
| 自在 | 炽热的太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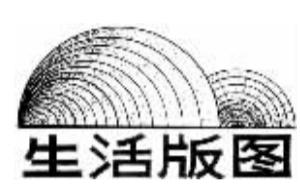
农民工

黄清松

从农村的希望田野
走进只见楼房高高的城市

渴望改变命运的农民
牵着妻儿老小的视线
前胸挂着城市
后背背着农村
开始了一个新的传说

大炕时代



让我们躺在一条简陋而又空气污浊的大炕上。我们生活在这一条大炕上，国家也出了安置费，每人150元“安家费”，就注销了我们每个人的城市户口，在陕北一条山沟里，把我安置在四分之一的土炕上，宽两尺，长六尺。

农家的大炕上摆着农家全部的生活内容。那时典型的陕北窑洞布局，进门是灶和锅，地上有一排水缸、酸菜缸和米缸，这是窑洞的前半部，与吃的主题有关。后半部是大炕，大炕靠里是炕台，上面放着被褥、木箱和炕桌。晚上，把被褥铺上，从外面拿回一只大尿盆放在炕角。睡觉时，长辈睡在炕头，那里是灶火的热风进到大炕下面风道的入口处，暖和，来了客人就让人睡在这里，老老小小睡在一一条大炕上，当儿女长大了，就再挖一孔窑洞，女儿嫁出去，儿子娶媳妇。关于农家的大炕我有一篇《想起土炕》，记录了我在与知识青年共同生活之外，与农民共同生活一年多的印象。

知识青年在大炕上同炕异梦的生活下去，除了劳作的艰辛让我们与失眠无缘之外，在特殊时期社会压力的铁钳下，生存本能也发挥着一种龟壳效应。睡觉的地方，应该是个私密空间，然而大炕却是集体宿舍、公共客厅和会议室。集体宿舍里，男人与男人之间，一切都是公开的，音乐家与女朋友的通信约会是公开的，小流氓之间的往来和活动也是公开的。比方说，马德祥就当着我们的面，把香皂丢进开水盆里，用两根手指往出夹，说是“练习”，他夹钱包的手艺就是这么练出来的，下乡了，虽说没有钱包可夹，但手艺不能丢生了！在小马练着开水里夹香皂时，沈宁拉起他的小提琴，他不拉样板戏，拉的是练习曲，这些东西在市面上讲也是“封、资、修”。沈宁叹一口气说：“下乡也好，老乡比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好多了，不会来敲门叫停。”

大炕时代，我就躺在长六尺宽二尺的土炕上。范加辉说：“这尺寸和埋死人的墓坑差不多。”我对他说：“不一样，坟墓冷冰冰，而我们的土炕下有热风，炕尾有尿盆，炕头还有一个油灯，吹灭了灯啊，长长的夜里，还有你和我各自长长的梦。”

又闻堂会声声

——北京湖广会馆听戏记

“云海迢迢月儿明，几回甜梦北京，卢沟晓月美，琼岛春意浓……”初冬时节，北京湖广会馆的大戏楼内，一场别具风格的京昆下午茶会正在举行，如诗如画的唱词、悠扬婉转的唱腔，顿时把观众带入了一幅充满老北京风情的画卷里。观众中有老有少，有的不由自主地打着拍子，有的边品茶边连连点头。精彩处，观众席中时不时地爆起“好！好！”的喝彩声。

堂会是从明末到解放前北京的一种重要演出形式，在会馆里看堂会戏，对许多北京人来说是个新鲜体验。湖广会馆这场“京昆下午茶·堂会”，是《盛世元音——京昆下午茶·堂会》参与“传统文化演出季”的首场演出。演出有京剧《小放牛》、昆曲《牡丹亭》、京剧《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折子戏，主要演员王艳、常秋月和赵群，分别来自北京、天津和上海。

湖广会馆始建于嘉庆十二年(1808年)，道光十年(1830年)集资重修，扩充殿宇，建筑戏楼，添设穿廊。民国元年春，印刷工人受辛亥革命影响，组织了“印刷同业进化会”，在湖广会馆开会提出“工人要团结组织起来，有话敢说，研究技术，改善生活”。此后，又有梁启超在会馆讲宪法纲领及两湖旅京人士在此筹款救济灾民。清朝重臣纪晓岚、曾国藩都曾在此或著书笔耕，或运筹帷幄。1912年，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先后5次莅临湖广会馆，在这里宣布国民党的成立。清末民初，京剧名宿谭鑫培、余叔岩等都曾在此登台演出，一时倾倒京城，为北京的历史增添了不传奇色彩。

“文革”时期，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堂会、会馆均被扣上“封资修”大帽子，传统戏曲一律被打入冷宫。会馆被多家单位和个人占据，院子里到处是私自搭建的小屋、厨房，人们在这里烧火做饭、洗衣洗菜，大戏楼成了仓库，堆满了杂物，百年古建变得残破不堪。为保护古迹，1984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湖广会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决定在湖广会馆建一座戏曲博物馆。

1996年，经过10年修复，北京湖广会馆正式开放。重修后的会馆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大戏台两侧有一幅抱柱楹联，上联写“魏阙共朝宗气象万千宛在洞庭云梦”，下联配“康衢偕舞踏营商一片依然白雪阳春”，上方为“霓裳同咏”匾。戏楼内均设置仿古硬木家具，客人围坐在一张张八仙桌旁，品茗赏戏，增添无限情趣。

今年退休的张丽珍女士原是湖广会馆的工作人员。她亲历了重修会馆，筹建戏曲博物馆的工作。她回忆说，1997年，一位酷爱京剧的台湾老先生来馆参观，他说在海外听说大陆把传统文化和古建破坏殆尽，没想到这里保护得这么好。第二年老先生又再次来到会馆，还捐赠了一张珍藏多年的“广德楼戏班演出”旧账单。老先生说：“这账单记载了梨园界的一段历史，把它捐给你们比我自己收藏更有意义，我相信，京剧艺术这一民族瑰宝在你们手里一定能够发扬光大。”

风风雨雨中，湖广会馆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沧桑巨变，现如今大戏楼每天都有精彩剧目演出，从下午到晚上，中外人士聚集在这里，听笙箫合奏、鼓乐齐鸣；看京昆艺人粉墨登场，演绎人生春秋。周末有时还有特为年轻人举办“青年京昆大课堂”活动，热闹的湖广会馆已成为京城文化生活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文革”时期，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堂会、会馆均被扣上“封资修”大帽子，传统戏曲知名电视剧编剧陈枰携《三七撞上二十一》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 11月16日，著名编剧陈枰将携全新力作长篇小说《三七撞上二十一》以及同名电视剧长篇小说，前者为首次发表28万字的全文本，后者则是最新修订本。

由于《三七撞上二十一》的同名电视剧已由上海文广投资拍摄，届时将邀请该剧主创人员导演马小刚，主要演员王千源、闫妮、李明启等将出席新书签售会。

(文艺)

说起改革开放30来年的事，我想到了莲姑。

莲姑是我的一个本家姑姑，我们从小就叫她莲姑，她的大名是什么，没人去问过。莲姑今年快70岁了。每次春节回老家，我都要去给她拜拜年，聊聊天儿。

莲姑在我们村可是个名人。

她的有名，是因为她能干，作为一个女人的能干。

30多年前，她能用手摇开沉重的柴油机，开着“小霸王”(四轮拖拉机)拉生产队员，去几公里外的黄河滩种地。在偏僻的平原农村，妇女开拖拉机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当时生产队里的人都啧啧称赞：“看人家这女人，多能，有力量……”

十年浩劫结束后，国家恢复发展，农村有了新气象。冬天农闲时间，大家没事干，村里准备成立剧团，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妇女们怕羞，没人报名唱戏，莲姑就自告奋勇找到大队文书参加了剧团。没想到，莲姑就成了主要旦角。莲姑不能算美人，但眼睛大大的，很有神；莲姑的嗓音不是很亮，可她的脸型好，扮相很俊俏，大家都愿意看。她唱的都是古装戏，像豫剧《三请樊梨花》、《辕门斩子》、《穆桂英下山》、《穆桂英挂帅》，从大年三十下午开始在村里的戏台上演出，一直演到正月十五。看戏的人黑压压一片，不时有人对扮演樊梨花、穆桂英的莲姑喝彩叫好。

莲姑演戏出了名。附近的村子也请她去演。有一天下午演《三请樊梨花》时，不小心崴了右脚，疼得厉害，扮演薛丁山的演员就劝莲姑休息，莲姑说：“这可不中，咱一停演，老百姓就不愿意了，大冷天的，人家白来了。”莲姑强忍疼痛，坚持扮演樊梨花演完，虽然台上走路、武打动作有些变形，影响了演出效果，可观众们还是掌声不断。到了晚上，莲姑在脚上贴了几张膏药，又接着演《穆桂英挂帅》。因为海报早已经贴出去了，不能报幕。第二天上午，莲姑又按约定去村委会的驻地慰问演出，虽然只有二三十个通迅兵，可莲姑一点也不马虎，认认真真地演了《辕门斩子》。驻地的战士们非常高兴，还给大队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土地承包到农民个人手中时，莲姑家分了5亩多地，一家人勤谨劳作，耕种犁耙，日

有两种人徒劳无功：一种人得到财富不肯享用，一种人空有学问却不肯实践。

【漫画】赵春青

□ 张明江

莲姑过得还算滋润。偏偏这时候，莲姑的丈夫得食道癌去世了，留下上万元看病的债，像一座大山压在莲姑一个人身上。四个孩子最大的十六七岁，小的男孩还没上学，一家人的生活困难。妇女们的学费无处着落，整天东挪西借。闲的时候，莲姑就琢磨着能再干点啥事挣钱养家。有一次赶集，她发现一些卖东西的人提着带拉锁的皮包，又新颖又实用，她想，现在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了，这种手提包可能会有很多人需要，看上去做工也不复杂，自己也能做，便上前打听提包的价钱，查看款式，问用的什么皮革，有没有衬料，等等。晚上收拾完家务，照顾好孩子们睡下，莲姑就找来一些废布头，照着白天见的皮包的样子，在缝纫机上做出个布提包。她提着包在屋里兴奋地转来转去，半夜没睡着觉。星期天，她揣着100多元零散的钱，和大女儿步行10多公里去县城采购了皮革、衬布、针线等原料。莲姑自己带着自制的提包去卖，售价比别人的包便宜两三块钱。一个月内，第一批17个皮包出手了，净赚了32块钱。

莲姑的皮包生意不好做了。几年间，中国的经济、社会有了大发展，大量的新鲜、时髦的东西涌进了乡村，莲姑做的皮包不但在城市，就是在农村也不再新鲜了。农村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变，村里竖起了路灯，胡同里的土道修成了水泥路，还专门有人定期到家门口收垃圾。莲姑也过了50岁，眼神有点不好使，不能再熬夜做皮包，她果断地停止了皮包生意。

客户的需求。莲姑做皮包不雇人，都是自己跑开封、郑州等城市和皮革商谈购买原料，回来后自己制作。后来，她改变了销售方式，不再上街卖，而是批销出去，省却不少事。

莲姑来可喜，做皮包成就了莲姑的姻缘。莲姑在邻县推销皮包时，认识了当地一位机关干部老李。老李50岁出头，人长得高大和蔼，性格爽朗，一来二去，俩人情投意合。因为怕街坊邻居说闲话，自己的孩子又多，不好施累人家老李，莲姑迟迟不提再嫁的事。过了两年，大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二姑娘又准备考大学，自己要做皮包生意，地里还有一堆农活，实在忙不过来，莲姑觉得身边有个拿主意的人会更踏实些，才和老李结了婚。因为孩子们不愿意去外县生活，莲姑婚后仍住在自己家里，老李经常过来帮忙，负责推销皮包，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一年后，莲姑家里搬倒了老房子，盖起了窗大门宽的全砖起脊房，屋内水磨石铺地，光光亮亮，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莲姑在村里不是第一个买收割机的，但50多岁时摆弄机械设备，这还真不是一般农村妇女能想到的。小麦成熟时节，在外工作的很多村里人不能回家收麦子，过期不割，麦粒就会掉在地里，因此必须抢收抢种，而高效的收割机就派上了用场。莲姑买收割机并不是自己开，是让已长大的小儿子学点本领。如今，成家的儿子不但有小麦收割机，还购置了点种机、玉米收割机、脱粒机，村里人再也不用进行高强度的田间劳作了。

如今，六十七八岁的莲姑已经赋闲，平时主要是帮助给幼儿园孩子做饭饭。她依然硬朗精神，穿戴整洁，见了面还高声和我打招呼，问我什么时候从北京回家探亲来了，快快家坐坐。我呢，只要是有空回农村老家，一定要去看莲姑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期，莲姑干了两件事：办了一个幼儿园；买了一部小型的小麦收割机。这两件看似不相干的事，却有着内在联系。

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被外面的世界吸引，陆陆续续出去打工了，很多人去了建筑队，有的搞起了运输，也有人南下进了工厂，还有的整年在外面跑买卖做生意，家里头剩

